

# 人民文艺观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内涵

□ 泓 峻

围绕人民性进行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就把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不断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人民文艺观的内涵加以丰富与发展。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受到人民文艺观的深刻影响。

**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是人民文艺观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的人民文艺观,不仅吸收了国外民主主义文艺思潮、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成果,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遥相呼应。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先秦儒家学派那里已经基本构建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天意与民意相通的“天命靡常”说、“民为神主”说;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中基础地位的“民惟邦本”说、“立君为民”说、“民贵君轻”说;强调以德治国,反对“不教而杀”;强调统治者应当克制欲望,加强内在修养的“五美”说;强调让利于民的“养民”“利民”说等等。这种思想不仅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也有十分直接的影响,并通过他们渗透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

对于儒家学者而言,政治哲学思想与其文艺思想是一体的,文艺命题往往就是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延伸。作为儒家文艺理论命题的“观诗”“观乐”说与听政于民的诉求之间,“怨刺说”与强调民意的表达与疏导之间,“诗乐教化”思想与教民、养民、乐民思想之间,都有着十分内在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通过两条路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立场产生了影响:一条是从古代民本思想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再到人民文艺观;另一条是从古代民本思想到中国古代文艺观,再到人民文艺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执政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人民文艺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观具有鲜明的底层取向,为五四之后的新文艺指出了一条意义深远的道路。**从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历程看,到了1940年代,左翼文艺已经有了一段自己的历史。怎样使其既保持革命性,保证其在理论与实践上与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及现代性的精神关联,又能够使其真正走进劳苦大众的生活,帮助他们改变自己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命运,同时还能够遵循艺术规律,创造出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发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指出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道路。而对文艺人民性立场的强调,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为核心的内容。这篇讲话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民文艺观的正式形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文艺服务对象的重要性,明确地讲“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的主体部分(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五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就是围绕着“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展开的,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如文艺工作者应当到工农兵当中去、向群众学习、普及与提高、文艺的大众化等等,阐述的实际上是实现文艺的人民性立场的途径与方法。

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观具有十分鲜明的

底层取向。在谈到文艺服务的对象时,毛泽东说它应该包括“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具体地讲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毛泽东尤其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与“左联”时期左翼文艺家在谈论文学大众化时,把大众界定为“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或者是“新兴阶级”比较起来,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纳入到了文艺服务的对象当中,而且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谈到文艺服务对象时,要么“工农兵”并举,要么“工农”并举,没有任何一次遗漏农民这一群体。

在当时的中国,农民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占据大多数,而且是受封建压迫最重、受教育水平最低、享有文化资源最少、距离现代文艺最远的一个群体,文艺大众化也好,文学启蒙也好,如果把这样一个群体排除在外,将是表面的、浮浅的。号召作家为农民而创作,创作适应农民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的文艺作品,让文艺真正走进农民的生活,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从而发挥提高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解放农民的功能,这应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此前任何一种文艺主张的地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放弃了对演大戏、搞西洋音乐、翻译外国文艺作品、争论高深文艺理论问题的热衷,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文化下乡运动,秧歌剧运动。

**新中国文艺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并根据时代的不同特点,对人民文艺观进行了丰富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明确了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毛泽东的人民文艺思想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人民性立场得到进一步强调。统观作为新中国文艺风向标的历次全国文代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发现他们都把坚持与发扬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当成一个重要主题加以阐释。广大文艺工作者也自觉地把人民文艺这一方向作为一面指导自己文艺创作的旗帜。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文艺观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人民观》,文学评论2013年5期),比起“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谈起“人民”这一概念时,已经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把重点放在了其阶级包容性的一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强调“人民”包括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改革开放之初,党把自己的文艺方针明确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则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一步扩展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的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上升为“人民”这一共同体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人民”这一概念又一次被进行了新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

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在这段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人民不仅仅是一个总体概念,它同时也指向“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种认识,将现代的人文关怀精神注入人民这一概念之中,更加切近艺术的本质,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民文艺观一次新的理论拓展。

**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在让文艺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执政理念出发,习近平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艺最重要的使命,使人民文艺观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文化层面。对高品质的文艺作品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赋予人民在文艺活动中更为突出的主体地位。

在强调用文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看重文艺精品的价值与作用。新时代文艺要想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首先应该使文艺的内容与人民群众具有相关性,表达出人民群众真实的愿望与诉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告诫文艺工作者要警惕把人民群众简单地当成消费者,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庸俗的审美趣味哗众取宠。

新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有了质的提高,而且在文化水平、艺术欣赏水平上,也有了质的提高,人民对文艺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多层面的,他们不仅希望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自己真实的存在状态,通过文艺作品传达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借助于文艺作品的阅读放松心情,实现身心的娱乐,同时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的阅读感受到生活的希望,接受真善美的熏陶,获得思想上的增益,找到精神的家园。这就需要艺术家“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文艺作品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起到塑魂铸魂的重要作用,这也构成新时代人民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可以找到民族文化的根脉,将现实与历史贯通;可以找到对国家的认同感,将自己个体的生命融入祖国的强大身躯之中,并因此获得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超越自然生命的有限性。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这种精神需要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博大的家国情怀,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建设精神家园,是当代文艺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方面一项十分崇高的历史使命。

如果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定义为诗歌狂飙突进的20年,那么新世纪的当代中国诗歌逐渐进入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壮阔之境。1999年叠峰论战以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阵营的分裂,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一种诗歌话语权之争,关乎诗歌本身的意义非常有限。随着论坛时代写作阵营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和博客的兴起,诗歌写作开始走向独立、多元。2004年8月李少君发表了《草根性和新诗转型》的重要文章,可以说是对当时诗歌写作现场的一次观念上的校正,尽管大多数诗人和评论家将“草根性”诗学定位在“底层写作”层面,带有一定程度的阶级分析论的色彩,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此文强调的写作对象和对形式主义写作的尖锐批评看,它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生物属性的诗学,重申了汉语诗歌的传统,有着清淤疏浚的重大意义。

最近10年,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真正实现了独立、多元的局面。2012年,楚尘文化传媒推出新陆诗丛,把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西川列入其中,标志着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民间写作有了一定的调和。2013年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标准丛书,作为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于坚跻身于以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方阵,更进一步体现了一种写作观念的包容和艺术视野的开放。在此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逐步成为新时期诗歌出版的重镇,陆续推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批实力诗人的诗歌作品。如陈先发的《写碑之心》、雷平阳的《云南记》、莫非的《莫非诗选》、池凌云的《池凌云诗选》、李少君的《自然集》、草树的《马王堆的重构》、李得的《擦玻璃的人》等,诗歌出版也摆脱了姿态性和观念性写作的局限,呈现出一种着眼于文本的、开放的视野。其次,每个年度的诗歌年选和诗歌排行榜,也有着大致追随了这样一种走势,尽管各自的视野依然有着一一定的局限。2016年,诗人周瑟瑟主编的《新世纪中国诗选》,更是以省份分列的形式对新世纪16年当代诗人的创作进行了一次鸟瞰式的搜寻和展览,力图以编者的视野所及和作者自选的方式呈现新世纪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但是也许受限于版面和其他因素,这样的选本依然带来遗憾——双重的遗憾,一是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一些优秀诗人,二是入选诗人也没有提供真正的代表作。比如臧棣的《万古愁丛书》和《挖掘从书》比一些入选作品,就有着更高的艺术成色,前者是对诗人张枣的纪念之作,打破了生死界限而实现的诗人之间的对话性存在,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元诗写作,其以诗论诗有了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微妙的语言知觉;后者则在汶川大地震下产生的作品,可以作为一种及时物作出色范本。作为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老将,孙文波此前写作的《新山水诗》,呈现出广阔的人文视野和语言生态,被忽略实为可惜。安徽诗人杨键2013年前后写作的长诗《哭庙》,以其浩大之“哭”和深入“文革”十年苦难的孤勇,为新时代提供了一种卓越的文体,尽管其思想观念仍带有某种姿态性。而陈先发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此一时期,当属《白头与过往》《口腔医院》《姚童》和《写碑之心》等长诗作品,在词与物的关系上做出了最为夺目的探索。甘肃诗人李志勇进入编者视野,他的写作给坚硬的“边塞诗”带来了柔软,其中更出色、带有异质的代表作,当为《墨水瓶》《红树林》等。于坚在新世纪的写作持续掘进,无论《拉比》《爵士乐》和《在布里斯本》,还是《波士顿以北》,都不应成为遗憾。他在2018年发表的《莫斯科札记》更是俯身大地倾听,达成语言自发性流动的诗歌生成机制,实为整体性观照和日常性呈现完美结合的杰作。福建诗人吕德安作于2010年前后的《适得其所》和《抚摸》等作品,远远超越了他的早期名作《沃角的女和女人》,其新作在生命经验和宗教情怀之间,都有出色的语言作为。而在我写作“当代湖南诗人观察”期间发现的湖南女诗人菊女,她的写作在艺术上的自觉和节制,在作品的完成度上,早已是一个成熟的优秀诗人,她的《风葬》《以为》和《古董》等作品,可以说列入当代任何最优秀的诗人之列都毫不逊色。

诚然,每一个选本,任何一个诗人或评论家,都不大可能凭一己之见勾勒出新时代诗歌的真正地貌,它的丰富和多样性、独立和多元化,无疑已经来到一片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气象万千的开阔流域,对称于这个好又叫座。”主演张译说。

在张译看来,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这个角色对演员的要求不仅仅是演技,更重要的是信念的建立和军事素养的体现。“感谢培养了我十年的军队,它赋予了我军人的风骨和品格,也把军人的职责融入了我的血液。拍摄过程中,我们更是亲眼见证了我国国防实力的强大。经历了半年的拍摄,我们终于将植根于骨子里的国防自信,用精彩的故事传递给了观众。”

精益求精、潜心磨励、锻造精品,让《红海行动》成为军事动作类型片的新标杆,也让电影《流浪地球》实现了国产科幻大片的类型破冰。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不仅是人类自救,而且是和地球一起逃离。《流浪地球》在海外外引发了一波不小的观影热潮,成为对外文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个鲜活案例。

电视剧《大江大河》豆瓣评分8.9分,这部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创作的献礼剧,让带有历史质感 and 情感温度的正剧占据观众注意力的中心;《那座城这家人》以“扎根生活”的剧情、温暖治愈的情感、真实质朴的画风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有评论称其以“大情怀、大题材、大时代和真善美”诠释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

本剧评选的一大特点是注重时代性和群众性,充分考虑作品的社会认可度、群众喜爱度、网络传播度。特别是对既有良好社会效益、社会价值,又在互联网平台点击率高,线上线下均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的作品,给予了重点关注。

## 新时代诗歌的多元化与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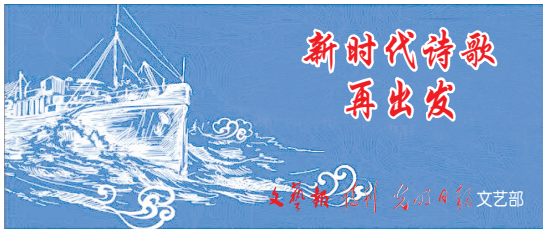
□ 草 树

伟大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正因为时代的急剧变化,现代文明的累累硕果,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水平,一方面也带来了精神的裂变和伦理的重构,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股裹挟精神和灵魂的暴力,放大了人性的贪婪,也放纵了享乐主义的虚无。社会的诚实信用还远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代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窗外的呼啸和风暴,被12cm的减速玻璃隔离了,人们只看见一晃而过的美景,像快速划过的静物画,而诗人们只有把耳朵伸到那12cm以外,倾听世间的真正声音,才能还原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真相。诗人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世界守成。不论诗歌如何边缘化,诗人正是在边缘守护着人的精神边界。如何书写新时代?在我看来,既要现代文明的成果延纳到语言的篮子,也要比常人保持着更大的清醒,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创作处境。

深入当代,言之有物。一个诗人的写作如果脱离了其处身的时代,那么其写作是可疑的,也是无效的。当代诗歌写作已经在观念上彻底排斥凌空蹈虚的抒情,诗歌审美也没有耐心和再接受这样的语言灌溉。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专业的诗歌写作者,可以说已经完成写作观念的革命,立足于个人性和日常性的写作理念,已经根植于每一个诗人的心中。诗人是语言的媒介,只有个体感受和生命经验的传递,才有可能使语言具备真正的“沟通能力”。在语言层面,所谓言之有物,其“物”一方面来自写作者的个人感受和生命经验,以及对个人处于时代的坐标轴上的具体处境的感知,甚至这个坐标轴还可以向传统和历史延伸;一方面是指语言形象,它作为语言形式给予词语以身份,以洞开世界万物的玄妙之门。而诗作为一种对话性的存在,无论这个对话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人、自我或潜在的读者,确立它的这一层定义的意义在于,诗人作为一个对话者即便在语言的内部也要保持一种谦卑的精神和倾听者的姿态,具备一种坦诚客观的态度。只有这样,最终才能让诗贴近真实,成为真理的维护者,建立诗性的正义。

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背后都站着伟大的传统。只有立足于传统的视野上,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当代世界的原发现场重重现象背后的真相。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诗歌语言势必成为无源之水。诗人拒绝传统,发展自己的诗歌流派或发明自己的诗学都毫无意义,壮大自己的粉丝队伍更是百无一用,甚至是有害的,真正需要做的,是不断地自我革命,耐心地俯身倾听。诗只有接受了“舌头的禁欲和苦行”,才有可能抵近词语的神性。曼德尔施塔姆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词语不是气孔而是千孔芦笛,不断地由各个时代的呼吸吹响。同时一个诗人和词语打交道久了,就会发现词语也有了灵性。所有伟大的古典诗人都在词语里活着,词语保留了他们的气息、温和和语调。词语既在死去的传统上张着耳朵,也具有召唤的本能,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就在于是否具有唤醒词语的能力,而前提是具有倾听的耐性和声音的辨析能力。唤醒词语召唤的本能,语言的聚集能力一旦显现,语言之途的景观就会超越个人和日常而呈现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时间、历史、传统甚至宗教的维度都有望洞开,一首诗构建的语言现实就有望转换成一种超越个人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诗也藉此达成它的见证的功能。

在城市文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作为一个诗人,面对这个时代最新的“自然”,在高铁和原野之间,在摩天大楼和湖泊之间,在跨海大桥和海洋之间,如何把它们延纳进入自己的语言形象工具箱,发现诗意或理趣,断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些都挑战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而反过来看,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面临的巨大的语言机遇。



(上接第1版)

“学习习总书记讲话,内心非常振奋,对我的鼓励非常大。回顾我这几十年的创作,特别是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等荣获‘五个工程’奖的作品,都是对生活有深入的了解、真实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编剧马连伦说。

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将右玉县干部群众近七十年植树造林、改变环境、造福人民的奋斗史搬上荧屏,感动无数观众。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让马连伦感触很深:“前前后后去了右玉无数趟,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都非常熟悉。右玉的春夏秋冬是什么样子的、群众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子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春天怎么种树、秋天又怎么种树、各种树木是怎么在黄沙里种活的等等,这些情况我通过不断去深入生活都做了认真细致的了解和体验。”

自从2018年12月首演以来,民族歌剧《沂蒙山》已演出50多场,生动讲述沂蒙革命老区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革命历史,让观众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沂蒙山,是人民军队胜利的靠山!沂蒙山,是军民同心的不朽丰碑!”对于此剧导演黄定山和他的创作团队而言,这是心怀敬意弘扬红色文化的创作过程,也是坚持民族歌剧守正创新的成功实践:“我们在《沂蒙山》的创作中,重视向传统的民族歌剧艺术学习,把歌剧艺术的根须深深地扎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剧组多次赴沂蒙老

区采风 and 体验生活,深入了解沂蒙故事、沂蒙精神、沂蒙风土人情、民歌民谣,感受传统戏曲及民间音乐、表演的艺术魅力和浓浓的乡土气息。”

无论是展现哈萨克族牧民走向定居农牧现代生活的电影《远去的牧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积极变化和社会巨大进步的滑稽戏《陈免生的吃饭问题》,还是弘扬“塞罕坝精神”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全景描写中国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是》,这些满腔热忱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的优秀作品,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用文艺的力量感召人鼓舞人。

《“事儿妈”宋小娥》是一部有趣、励志、温暖,听后让人深思的儿童广播剧。“作为成人创作者,怎么才能让写出一个鲜活的角色为孩子讲故事?这是我们在创作中时刻在问自己的问题。我们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交朋友,知道了他们最爱玩的游戏、最爱说的口头禅、最爱看的动画片,了解他们最讨厌什么、最不希望大人干涉他们什么。”编剧潘海琳说,我们的戏立足于童真童心这一命题之上,用真诚和真实拷问生活、表现社会,表达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2018年,作曲家王黎光赴贵州采风,有一个故事强烈吸引了他,这就是“天眼”工程总工程师南仁东的事迹:“喀斯特的山水水、黔南的乡音乡情,与‘天眼’之光相辉映,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扑面而来地碰撞着我的内心世界,进而也激发和释放了我的艺术创作能力,《心远天高》作曲

过程一气呵成。”

“必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才能做人民的艺术家,必须五体投地地扑向生活;在融入对中华大地的触觉、对青山绿水的视觉、对五谷丰登的味觉和对浓郁乡音的听觉中,形成文化担当的自觉。”从十二届至十五届“五个工程”奖蝉联获奖的王黎光如是说,“艺术家从自我生活的灵性,到文化碰撞的灵气,最终上升到国家时代的灵魂,从小我到大我,方能实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潜心磨砺锻造精品,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用文物讲文化,用文物梳理文明,用文物定位时代坐标,以全新视角揭秘中华文物之美,生动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以歌队、舞蹈队烘托气氛,巧妙运用信天游、花儿等民歌小调,音乐性和表现力明显增强;《主角》《北上》《云中记》等文学作品富有历史纵深感,展现出良好的精品特质和文学价值。

不少评委认为,本届获奖作品制作精良,艺术质量进一步提升,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着力弘扬传统文化,凸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8年,《红海行动》以36.5亿元票房成绩荣登春节档电影票房冠军。“只要以真诚的创作态度,付出辛勤的汗水,主旋律电影一样可以叫

好又叫座。”

在张译看来,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这个角色对演员的要求不仅仅是演技,更重要的是信念的建立和军事素养的体现。“感谢培养了我十年的军队,它赋予了我军人的风骨和品格,也把军人的职责融入了我的血液。拍摄过程中,我们更是亲眼见证了我国国防实力的强大。经历了半年的拍摄,我们终于将植根于骨子里的国防自信,用精彩的故事传递给了观众。”

精益求精、潜心磨励、锻造精品,让《红海行动》成为军事动作类型片的新标杆,也让电影《流浪地球》实现了国产科幻大片的类型破冰。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不仅是人类自救,而且是和地球一起逃离。《流浪地球》在海外外引发了一波不小的观影热潮,成为对外文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个鲜活案例。

电视剧《大江大河》豆瓣评分8.9分,这部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创作的献礼剧,让带有历史质感和情感温度的正剧占据观众注意力的中心;《那座城这家人》以“扎根生活”的剧情、温暖治愈的情感、真实质朴的画风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有评论称其以“大情怀、大题材、大时代和真善美”诠释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

本剧评选的一大特点是注重时代性和群众性,充分考虑作品的社会认可度、群众喜爱度、网络传播度。特别是对既有良好社会效益、社会价值,又在互联网平台点击率高,线上线下均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的作品,给予了重点关注。

纵观本届获奖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更加突出,影响力明显增强,较好实现了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相统一。《流浪地球》《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三部影片的累计观影人次近3亿,票房合计达114亿元。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其相关视频播放量就达74.6亿次,歌曲《点赞新时代》入选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广场舞推广曲目,传唱度较高。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示范工程、响亮品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将在筑就文艺高峰的征途上,努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 王杏元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原副主席王杏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8月11日在汕头逝世,享年88岁。

王杏元,原名王实力,中共党员。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绿竹村风云》《无皇子的子民》《神武金鉴》,纪实文学《钢铁运输线》、剧本《乱世三美人》等。